

民主德国经济失败原因探析^{〔*〕}

○ 王 涌

(华东理工大学 德语国家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7)

〔摘 要〕民主德国经济失败只能在相对意义上才能站得住脚, 相对于西方国家经济, 主要是联邦德国。正是由于经互会国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劣势, 使得其中的佼佼者面对联邦德国才显出失败的态势。这个态势不能笼统归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 而是由内外部多方面原因导致。内部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因素对经济的绝对主导, 以致出于意识形态缘故而不惜违背经济规律, 使得计划完全脱离市场, 成了不顾事实的主观任意行为; 外部原因主要是苏联的控制和整个经互会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前者使得其无法从民族经济利益角度去看待经济问题, 后者使得其外贸强项的实际经济值大幅下降。所以, 民主德国经济在与联邦德国的同比中最终被舍弃, 不能简单归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 它与多方面因素相关。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命里注定要失败的, 就像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命里注定会成功的一样, 关键在如何计划和如何市场。

〔关键词〕民主德国; 计划经济; 经济改革; 政治经济; 经济政治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8.021

民主德国最终解体, 被联邦德国合并, 原因大多被归为经济失败。这也确是事实, 但是,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民主德国曾经“自诩已跻身于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1〕}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最终因经济因素而走向垮台呢? 问题应该有其复杂性。民主德国经济最终失败不仅有其内部和外部原因, 也有经济本身和非经济方面的原因。正是在这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民主

作者简介: 王涌, 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 华东理工大学德语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 从事德国史以及德国问题研究。

〔*〕本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德国经济, 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变化研究”(批准号: 09BSS016)的阶段性成果。

德国才最终支撑不下去,走向解体。

一、经济方面原因

一般而言,谁都会将民主德国经济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这当然无可厚非。迄今世界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事实业已表明:凡是走单一计划经济道路而不引进市场因素的经济体制,由于将计划弄成一种脱离实际的强制,最终都面临困境。但是,不能由此就将计划经济本身判为万恶之源,更不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普遍失效而否认计划本身。民主德国经济的最终失败单就经济因素而言,有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内部因素当然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但是,体制是人为设定的,并不是一个凝固的、封闭的东西。因此,在具体层面,民主德国经济失败的原因应该在没有把握机会,适时调整,从而将计划错误地变成只顾原则不顾实际的教条,最终使计划变成一种强制,无视市场的声音;外部因素在于其所依赖的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经互会国家,整体走向衰败,这就使得由此而来的核算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整体上呈劣势,即便在这个体系中成为佼佼者,也会被整体的衰败而拉下水。

东西德地区本来是一个国家,其间经济能力基本一致,差别不是很大。因此,二战刚结束时,在1945—1947年间,东部地区的生产总量甚至还超过西部地区。这一状态使得东占区的苏联信心百倍地拒绝了西占区在全德国建立统一经济体制的提议,一意孤行决定在东占区奉行计划经济。于是,拒绝西部地区的货币改革,1948年6月24日实行自己的货币改革,发行东德马克取代帝国马克。1949年3月19日东德宪法出现,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奉行计划经济,价格和工资都由中央统一制定。建国初期的这些举措本身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失败先例的情况下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计划经济本身天生有着伦理方面的亲和力。但是,当时人们没有或者不愿看到,战后头几年东部经济总量的提升不是靠生产率,而是靠大量劳动力的投入。这使得对东部经济一开始就带着一些盲目的信心,以致问题出现时不愿正视,而是一味坚持计划经济原则,没有适时进行调整。问题在1950年时就已出现,此前经济基础不比西德差的东德经济立马被西德赶上。^[2]1950年西德生产率已经高于东德20%—30%。这本来应该看到,经济发展要将重点放在提高生产率上。当时,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东德的重视,人们怀着前几年建立的自信,依然热衷于从原则而不是现实出发的国家计划,不顾实际出现的问题,刻意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原材料和重工业上,忽略了作为生产率根本的人,忽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说忽略了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50年代早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消费品立马出现紧缺局面。于是,1953年6月17日便出现了群众的不满(Unruhen)。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是一如既往地将重点放在重工业上而忽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结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1955)没有达标。本来,这时应该重新考虑计划体制问题,修正计划经济无视市场而成为了一种强制的弊端,尤其是波兰1956

年秋、匈牙利 1956 年 10—11 月因此出现的政治波动,更应促使当局认真审视经济领域的偏废。可是,当局还是一味坚持原来的计划,将其变成了一种强制,对于老百姓的不满则用提高工资去安抚。恰恰是这一违背经济规律的举措,即不是改善生产而是单一增发货币,使得问题雪上加霜,社会上出现了有钱买不到东西的局面,物品价格上升。为了应对,东德政府还是不在体制上做调整,而是在 1957 年 10 月 13 日,进行了第 2 次货币改革,强行压制市面流通资金。做法是每人可以 1:1 换 300 马克新货币,其余钱必须存银行,而且对于流通资金严格审查来源,看是否来自黑市。这近乎将国家干预推向了极端,结果只能是人为而刻意地减少了市场流通资金,价格上升却无法遏止。面对经济上的糟糕局面,社会上出现了政治摇摆,一批“修正论者”(Revisionisten)包括著名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以及一些政府官员主张正视经济政策的失误。这时,迟迟出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虽不再实行,但代之而起的七年计划还是没有将重点放在改革和调整上,而是进一步沿袭了原有的计划,对于 50 年代末出现的改革呼声不惜用政治手段强行压下去。直到重新制定的七年计划又失败的事实摆在面前时,政府才在 1963 年 1 月 15 日的第 6 次党代会上开始讨论改革问题。一年后,出台经济改革方案,旨在“用中央计划与经济杠杆的结合去代替计划管理和中央命令式领导”。^[3]由此开启了 60 年代的经济改革时期,所谓“经济试验”。试验的内容主要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入一些市场经济因素,如中央不再单独硬性计划,而是开始顾及经济和市场规律,要求企业将盈利放在重要位置,做到经济上自主盈利,等等。这场改革使得当时五年计划的实现程度都比 50 年代要高,东德经济开始出现明显好转,思路和做法开始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民营经济的比重明显提升,甚至在 1971 年中旬的第 8 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以后计划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 50 年代人才大量流失,劳动力缺乏成了遏制 60 年代东德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高质量劳动力的流失又成了提高生产率的重要瓶颈。这场改革虽然使得东德经济明显好于 50 年代,但还是没有将改革后的经济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本来,60 年代的经济调整已经姗姗来迟,而且成效还没有完全出来,恰恰在需要延续的 70 年代上半叶,却有人担心国家由此变色。70 年代中期昂耐克上台后基于这样的担心又开始强调中央调控,将改革中引进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剔除了出去。从此,五年计划又开始脱离实际,又开始了只有计划没有兑现的时代,东德经济又进入下滑通道。由于强化了国家,忽略了市场,在生产下滑的情况下又增发工资,社会重又回到产品不足的困境,有钱买不到东西。同时,出于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又必须强撑社会福利。于是,通过海外贷款(主要是苏联)来扩展社会福利,贷款额甚至达到了国家根本无以偿还的地步。由此,东德经济进入了崩溃的边缘。

因此,民主德国经济最终失败的原因从经济角度看,并不单纯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而在太执着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太固守计划经济的一些原则,以致

没有适时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进而不断违背经济规律。早在5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推行后生产迅速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就理应采取调整措施,适当引进一些市场因素,以激发经济活力。60年代出现的改革虽然在内容上基本沿着此方向前行,但一者由于出现得太晚,二者由于时间还不够长,这就使得其无法从根本上将民主德国经济推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出现得太晚”是因为当时民主德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尤其是大量劳动力已经流失。这就更加要求改革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显出效果。可是,在这样的时间到来之前,昂耐克上台,改革又中断,并相当程度回到了从前。这就使得民主德国经济1989年时较之于联邦德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落差。早在两国经济刚刚起跑时,联邦德国就已经迅速领先,到1989年时,巨大的落差使得民主德国的老百姓不再愿意接受自己的国家。国家解体,民主德国的计划经济自然消失。

表面看,问题似乎又在计划经济上。诚然,民主德国太固守计划经济的一些原则是其经济失败的原因所在。但是,如此不顾实际地固守计划经济的一些原则,并不是计划经济的本来面貌,无论就体制还是计划本身而言,都是这样。计划经济完全应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即便体制本身也是可以修正与改善的,因为计划本身就有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之分,同时又有结合实际与脱离实际之分。60年代民主德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抛弃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而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了一些市场性因素,使计划开始贴近实际,开始对基层不具有原先的绝对强制性。其效果也是明显的,只是开始得太晚,所以欠债太多,以致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见效。这样说并不是指此后昂耐克的“经济政策是民主德国经济走向失败的罪魁祸首。昂耐克的“经济政策较之于60年代的经济改革固然又强化了中央集权和强制性计划,但那不是简单回到50年代的计划经济,而是在进行了改革的新条件下实施计划经济,不仅比50年代更看重与市场经济因素的结合,而且还由国家募集资金(海外贷款)来改善福利条件,如住宅建设。

昂耐克刚上台强化计划经济不久,于1978年也开始进行改革,如“改革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机构,取消中间环节,实行工业部,联合企业两级管理体制。”^[4]“规定联合企业是工业,建筑业和其他国营经济部门从事物质生产的基本单位,在联合企业内部建立相对完整的再生产过程。”^[5]“扩大总经理的管理权限,实行管理人员的严格责任制。”^[6]“建立和完善联合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7]“改革和调整工业品价格。”^[8]“完善联合企业中的党组织,改进党组织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法。”^[9]“进一步完善国家经济领导机关的经济领导工作”^[10]等。这些都表明,昂耐克推行的计划经济较之于50年代,更加尊重经济规律,开始“注意慎重处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11]，“注意行政方法与经济手段的结合”^[12]，“注意集中领导与分权经营的统一”^[13]，“注意处理经济改革与实现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14]等等。这些明显是对原有计划经济有了调整和改善。昂耐克时期,这样的调整不断出现,如“1986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注重提高生产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规定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内技术产品要增长

50%。”^[15]可惜,由于长期积蓄的问题太多,加上中央层面缺乏对应的改革,到了80年代末,东德最终解体。

昂耐克应该是导致东德经济失败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最终原因。最终原因是在计划经济问题上过于教条,没有适时进行调整,而且即便晚到的调整也不够彻底,仅是停留于经济运行层面,而没有深入到顶层,深入到体制内部,没有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进行调整。如昂耐克的改革就没有深入到中央计划层面,以致民主德国经济在结构上始终失衡。比如,1989年时,“民主德国的褐煤产量是联邦德国的2.7倍。”^[16]如此这般的过度开采固然是为了减少进口,因为外汇紧张。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反而会使国民经济因结构失衡而越来越糟。同样,社会福利方面不惜举债大规模建设住房这一点,撇开其没有经济实力情况下过度福利建设的偏废暂且不论,就如此力推住房建设这一点来看也是脱离当时国民实际而非常失策的,因为住房只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此重点发展住房建设,也就只是将人民生活维系在最低的基本需求层面。70—80年代民众出现不满,觉得赶不上西德时,国家还是将有限的财力大量投入建房,如此失衡的福利建设最终还是扭不回百姓的不满,因为其他严重落后,只有住房,是无法让人对生活满意的。众所周知,80年代末东德百姓走上街头表达的不满,不是住房,而是其他生活用品的困乏,尤其是日常生活用品。这些都是顶层脱离实际的强制性计划所带来的后果。

因此,昂耐克的经济政策虽然在很多方面已经有所改革,但由于没有深入顶层,没有深入到体制内部,即国家计划方面的失误,最终还是无法解决问题。所以,就民主德国经济失败的经济原因来看,不能笼统地归之于经济体制本身,而应具体看到体制内的错误计划才是根本失误所在。恰是不顾实际一味只看原则的计划使得民主德国经济最终远远落后于联邦德国,以致最终被整合。从社会角度看,计划经济理应有其利于宏观调控的长处,但是,脱离实际,脱离经济规律的计划,反而将此长处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抽去。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与计划本身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计划经济体制有赖于合理的计划来支撑,合理的计划又有赖于特定的体制来贯彻,这个体制必然是计划经济的。民主德国经济失败的原因应该在于不顾经济事实,违背了经济规律,没有适时对体制进行调整,以致最终失去了进行有效改革的良机。这里应该看到的是,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计划经济,完全走市场经济道路,其间还有一条两者结合的中间道路可走。

二、非经济方面原因

本来,协约国想在东西部不同占领区建立统一的经济体制。但是,苏联从自身政治考虑出发一意孤行,在1945年7月21日没收了其占领区内所有银行的财产,同年9月3日没收了所有私人财产,9月30日将所有工业和贸易设施收归国有。1946年4月21—22日又迫使苏占区原来的德国社民党(SPD)和共产

党(KPD)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die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即 SED。1946年6月30日苏占区关闭了通往所有其他占领区的边界,1947年6月14日成立德国经济委员会(Deutsche Wirtschaftskommission),简称 DWK,1949年开始将农民土地收归国有。由此,东部地区走向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因此,民主德国的经济道路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经济考虑,而首先是政治因素的产物。此后整个经济发展同样首先不是由经济因素本身,而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运行总体上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这应该是民主德国经济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就是说,非经济方面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是其走向失败的最终原因,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本身。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上不断走向新的成就,最终根源同样也不单纯在经济体制本身,而是与之相反,由经济因素本身出发,而不是由政治出发,去运作经济。

对于民主德国经济失败的原因,一般共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重工业比重太高。殊不知,这在当时恰是政治考虑高于经济因素的产物。早在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初的50年代,这一问题就已经通过消费品奇缺凸显出来,而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失败已从根本上表明:如此计划经济有其明显弊端。当时,人民大众,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和随之而来的移民联邦德国潮,应该足以促使当政者进行适时的经济调整。但是,出于政治原则方面的考虑,政府一味坚持原有的做法,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途夭折以及紧接着的七年计划失败后,才姗姗来迟地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但那不是体制方面,而是管理方面的改革。即便这样有限的改革也在经济方面立马见效,使得60年代至70年代初民主德国经济较之于50年代明显好转。这次改革“从民德历史上已经是实现了工业化,有发达工业基础的国家的实际出发,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在改革中探索民德自己的发展道路。”^[17]可是,又是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这个还有很多发展空间的改革又不得不中止。正如国内学者肖辉英和陈德兴所言,这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止“并不完全是由于改革本身带来一些弊端,而是与当时民德所处的环境,人们的认识以及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都有关系。”^[18]具体来说,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在改革问题上,党内认识不统一,存在着矛盾。”^[19]“第二,改革过程中出现比例失调,营私舞弊等问题,引起经济混乱和困难。”^[20]如改革中“过分强调化工,电气电子,冶金加工(后改为仪器制造),机器制造等四个部门的发展。”^[21]“第三,苏联施加压力,遏制民主德国的经济改革。”^[22]所有这些都与政治有关,即便比例失调也是行政命令的产物。总之,“主要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内部对改革有严重分歧,有些人担心经济改革专家和知识分子掌握了党的基层权力,动摇党的地位。”^[23]可见,好不容易出现的这次改革,最终又被政治上的考虑扼杀。昂耐克时期进行的一些改革或调整本身也始终被政治考虑所统摄,其间虽在经济管理方面有其合理性,但主导框架中的政治考虑还是使其坚持一开始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并出于政治考虑不惜向民众隐瞒国家经济实情,制造国家经济繁荣的假象,如通过贷款来扩充国家福利建

设。当这个假象被捅穿后,国家解体,民主德国经济彻底失败。

可见,民主德国经济失败最终归结于政治因素至上,以致不尊重经济规律而只考虑政治利益,也就是说,民主德国经济失败主要并不是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是政治介入经济的问题。进一步看,“他们没有真正处理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强大经济力量在两种制度较量中的威力和作用。”^[24] 同比而言,联邦德国就将这问题处理得很好,政治上由经济说话,由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成就来达到政治目的,国内政党更替等都以经济为核心。可以说,民主德国奉行的是政治经济,联邦德国是经济政治,一个政治为先,一个经济为先。在民族统一问题上,民主德国也过于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过失所在。^[25] 所以,民主德国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笼统在体制本身,而在于不顾经济实际,不尊重经济规律,说到底在于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不顾经济实际”就是由于政治原则领先的缘故。本来,经济体制上的计划和市场就是一对孪生姐妹,其间并不是相斥的关系。计划经济也罢,市场经济也罢,其实谁都离不开谁。唯有二者的交互作用,互相制衡,才能使经济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民主德国由于意识形态介入的缘故,使得其计划经济中融不进市场因素,最终走向失败。相反,联邦德国经济成功也不能笼统归入其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其中融入了计划因素(国家调控)的缘故。可以说,民主德国经济的受挫也从反面给联邦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教材,提升了其领先的机遇。正如国内学者所说:“民主德国历次求索的失败,都为联邦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和提高社会福利方面显示其暂时的优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6] 此外,50年代大量高素质东德人进入西德,也明显给联邦德国经济带来了良好发展机遇,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立后,联邦德国便开始出现缺乏素质较高劳动力的问题,此后进入西德的南欧人,整体教育背景远不如东德人。

三、外部方面原因

战后德国被分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本身就是外部因素所致,它不是德意志民族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各自命运都很大程度与这些外部因素有关。就民主德国而言,其成就和失败长期以来被看成是莫斯科的产物,就充分说明这一点。民主德国经济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也很大程度来自外部,来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来自联邦德国的挑战。总体而言,这个外部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苏联的控制;其二,经互会经济的整体失败;其三,联邦德国经济成就给予的压力。

民主德国建国后,隶属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之列,政治和计划经济模式都来自苏联。“由于依赖苏联和国家主权没有完全恢复,在制订重要政策时,民主德国积极主动与苏联协商一致。从皮克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民主德国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与苏联协商后做出的。”^[27] 实行计划经济伊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以及国家经济结构的建立就是在苏联的首肯下实现的。50年代经济出现问题

时,之所以还一味坚持原有的做法,经济结构也不做调整,就是当时苏联老大哥的意志使然。60年代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出现成效时,也是由于苏联方面施加了压力^[28]才突然中止。在具体经济问题上,也基本是苏联的意志成为主导,尤其是外贸价格的制定。在经互会范围内,民主德国主要是一个出口国,但出口物品的价格要按照苏联的意志来。这就使得外贸价格为了满足苏联的要求往往牺牲了民族经济的利益。如,民主德国出口到苏联的机器产品的价格不能按照市场来定,而苏联出口到民主德国的原油价格则可以按照市场因素来。这就使得苏联原油价格的提升远远超过民主德国机器产品价格的提高。^[29]所以,“在苏联完全控制华沙条约组织成员的情况下,统一社会党实际上没有回旋空间,以解决因不同利益而产生的问题。”^[30]因此,苏联的控制是民主德国经济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便民主德国的最终解体也与苏联密切相关,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开始放弃由来已久的控制并让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的事务自主决定。这时,早就由无法偿还的外国贷款支撑的民主德国经济已经无力自救,当1989年动荡期接替昂耐克上台的克伦茨(Egon Krenz)还想用转向市场经济来拯救民主德国经济时,为时已晚。不仅人民没有了信心,国家经济实力也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个改革了。

整个民主德国经济发展中,就官方公布的数据看,经济似乎并没有那么糟,1950—1970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8%,1971—1989年年均增长5%,^[31]工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商品的90%。^[32]昂耐克时期公布的数据甚至可以使民主德国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收入方面,民主德国“人均实际收入每年增长4.5%左右。”^[33]但是,这些数据中有着相当大的水分,这个水分不是由于统计有误,而是主要来自经互会国家经济的整体下滑。民主德国如此之高的工业产品出口主要是出口到“经互会”国家(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撇开外贸价格的不合理性因素外,按照经互会价值和价格体系计算出的增值,很大程度被世界经济范围内越来越糟糕的整个经互会国家经济所抵消。国际货币系统中,东德马克的实际贬值就是鲜明体现。可以设想,如果经互会国家经济没有整体下滑,民主德国的经济也许不会那么快垮台,毕竟它是经互会国家中最具经济实力的国度。

苏东集团中,民主德国经济还面临着一个特有的问题:联邦德国。人民不由自主地会将本国经济与联邦德国经济放在一起比较。这给民主德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压力。稍有问题,人口就会移向联邦德国。战后头几年,东部地区经济的出色表现就是由于投入大量劳力所致。1950年之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劳力去了联邦德国,尤其是高素质的劳力流失尤为明显,这给民主德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创。即便最后到了1989年时,民主德国经济固然已经很糟,但还没有遭到让人活不下去的地步。恰是联邦德国的榜样使得民主德国人民不愿意再接受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国家最终垮台。民主德国经济几十年的发展一直在与联邦德国比,人民这样,国家也这样。正是这种对比使得民主德国最终放弃努力,走向垮台。

因此,民主德国经济走向最终垮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内部的和外部的,不能简单将之归为计划经济本身造的孽。国内有学者认为,昂耐克上台后70—80年代初进行的工业体制改革本可以拯救民主德国的经济,^[34]这种观点是有些片面的,它没有看到影响民主德国经济的多方面因素。昂耐克的改革是消除了一些不利经济发展的因素,撇开其还没有引进市场性因素这一点而言,遏制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没有根本改变,民主德国经济不可能出现令人满意的好转。加上昂耐克基本上还是坚持和强化了政治经济的原则,没有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这就根本上排除了民主德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可能。因此,在经互会国家状况整体上没有好转,自身计划经济原则总体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很难设想,民主德国经济能走出困境,也就是说,不引进市场经济因素的计划经济一般不会奏效,更何况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很难再让民主德国公民安于自己的经济实验了。

注释:

[1][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6][28][34]肖辉英、陈德兴:《德国:世纪末的抉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37、22、22、23、23、25、25、26、26、26、26、31、272、20、16、16、17、17、19、20、20、272、21、11页。

[2]A.Ritschl: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Wirtschaft der DDR — Ein Zahlenbild 1945 — 1989, JbW (1995), S.17, S.21—22.

[3]Michael von Berg: Die Wirtschaft der DDR, “Neue Zueriche Zeitung”, Nr.224 und 225 vom 16. und 17.8. 1968.

[25]吴友法、邓红英:《从主张德国统一到寻求民族分离——1949—197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政策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7]邓红英:《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29][31][32]张炳杰:《德国——历史与现状》,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3、162、162页。

[30]辛蕾:《融入欧洲: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33]吴友法等:《当代德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